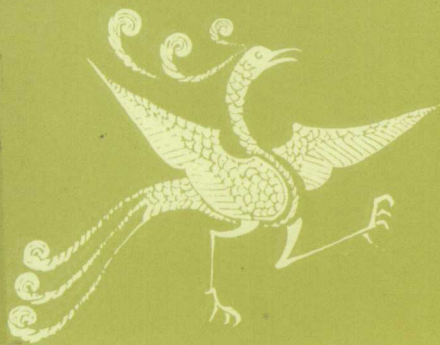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汉魏名士研究



刘
蓉
著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社会阶层,也是历代史家关注的焦点。关于士族的形成,学者多倾向于魏晋士族从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至于其中的具体环节,则多阙而不论。

本书围绕这一史学领域中的重大问题,通过对汉魏名士的深入系统考察,提出了汉魏名士是由东汉世家大族转化为魏晋士族的过渡形态的新见解,为克服士族和士族社会形成史研究的盲点,找到了一个有效的破解之道。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汉魏名士研究

刘 蓉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名士研究/刘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9.9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7036 - 1

I. 汉… II. 刘… III. 知识分子 - 研究 - 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7787 号

书 名 汉魏名士研究

著 者 刘 蓉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许旭虹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6½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036 - 1

定 价 38.00 元

序

我很高兴地看到刘蓉博士的著作《汉魏名士研究》就要出版了，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给这部著作写序。我给自己和别人的著作写过不少序，但给自己的弟子写序，好像还是第一次。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一直以来都是史家格外关注的非常有特色的社会阶层。士族从曹魏以来不断发展，到东晋时演变为较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处于整个社会的主导地位，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关于士族的形成，学者多倾向于魏晋士族从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至于其中的具体环节，则多阙而不论。

刘蓉研究与探讨的，正是这一史学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她通过对汉魏名士的深入系统考察，提出了汉魏名士是由东汉世家大族转化为魏晋士族的过渡形态的新见解，为克服士族和士族社会形成史研究的盲点，找到了一个有效的破解之道。在具体的论述中，刘蓉以名士阶层的内部分化作为考察和分析汉魏政治生态演变的基本线索，这就为研究汉魏政治史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和视角。这样，从对社会阶层的分析考察着手，刘蓉在魏晋士族的形成问题上，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极具创新性的观点，并进行了个性鲜明而又严密细致的论证。她的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可以说是魏晋士族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的突破性进展。她所提出的汉魏名士为士族形成中的过渡形态的新见解，以及具体论证过程中的诸多创见，如汉魏名士的地域特色，魏晋之际名士价值取向的分野，名士中的事功派与浮华派，名士与皇权的相互依赖、矛盾及最后达到平衡等问题，都值得史学界进行广泛研究和讨论。

刘蓉200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成为我的博士研究生，随我攻读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史。三年的相处中，刘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她是北大 88 级的学生,是跟我相差 57 届的校友,只是她的本科专业不是历史学,而是图书馆学。她在几经挫折后直到 1999 年才考入陕西师范大学读硕士,学习先秦史,硕士毕业后,直接考入北师大。刘蓉知识面广,文史基本功非常扎实,而且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坐冷板凳,学习非常刻苦,这在同龄的年轻人中显得尤为突出。

更让我觉得欣慰的是,她的性格中有许多极为难得的优点。她正直善良、嫉恶如仇,既温文尔雅又豪爽果决,待人热情、谦和、明快,严于律己,有极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办事能力很强。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不止这些,我最欣赏的是刘蓉思维的敏捷活泼和文笔的优美流畅。与她交谈中,时时能感受到她对历史、对社会的独到见解,她的思维是跳跃性的,不受任何框架的限制,她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都保持着小孩子般的热情和好奇,她对权威保持着应有的尊敬却从不会被权威所束缚,敢于怀疑,勤于探索。这些优点,正是一位史家所应当具备的,也正因为她具备这样的优点,所以我对刘蓉有着极高的期望。如果今后她能够有较为宽松愉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加上她一贯的聪慧与勤勉,我想刘蓉是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何兹全
2008.12.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东汉以来名士阶层的形成	11
第一节 名士的兴起——以颍川、汝南、南阳郡为中心	11
一、汝颖南阳的经济与社会	11
二、汝颖南阳文化圈的形成	16
第二节 名士与党锢	27
一、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27
二、汝南名士与汉末政治	44
小结 名士阶层的形成及其特点	51
第二章 汉魏名士阶层的发展	54
第一节 名士的重新崛起	54
一、党锢名士及受株连者之再起	54
二、名士袁绍	59
三、名士曹操	61
第二节 汉末名士的地域局限及其政治影响	76
一、汉魏之际的汝颖、冀州名士	76
二、曹操据有兖州与兖州之叛	93
三、汝颖名士与谯沛集团	106
四、谯周劝降与汉魏之际地域观念的转变	113
小结 名士阶层的地域分化与融合	125
第三章 名士阶层的内部分化	130
第一节 汉魏名士中的事功派与浮华派	130

一、事功派名士及其特点	131
二、浮华派名士及其特点	144
第二节 事功派与浮华派名士的冲突	152
一、事功派与浮华派名士的分歧	153
二、魏明帝禁浮华	160
三、事功派与浮华派名士的冲突	175
小结 事功派与浮华派名士的冲突与融合	182
第四章 从名士到士族	189
第一节 名士与皇权力量的消长	189
一、建安名士对于皇权的进一步冲击	190
二、名士与曹魏皇权的妥协	196
第二节 名士及其特点	207
一、“士名”与“名士”	208
二、名士的特点	217
三、名士阶层特权的获取	228
小结 名士阶层的凝固	237
结 语	240
参考文献	247
后 记	253

绪 论

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是当时十分令人瞩目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经由汉末、建安的动荡、纷纭，至魏晋变而为独具特色的士族。唐长孺先生称“门阀制度源于两汉以来的地方大姓势力”^①，田余庆先生认为魏晋士族与东汉的世家大族一样，都是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势力的表现，“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没有东汉世家大族的存在，就不可能出现魏晋士族阶层”。但是，正如田先生指出的那样，说魏晋士族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延续，只是就社会阶层演变的整体而言，因为“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宗族而言，只有少数几家具具有东汉世家大族渊源；多数并非由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而是魏和西晋因际遇而上升的新出门户”^②。唐先生在《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中也指出，“东汉以来培养、滋长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决不是所有汉末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晋时成为士族，也不是出于单家就都像吴质那样，乡里‘不与之士名’”^③。也就是说，东汉世族只是魏晋士族的基础，是魏晋士族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东汉的世家大族得以演变为魏晋士族，还应该另有另外的一些条件。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这种从世族到士族的转化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两个问题，就是本书试图探究的重点所在。

在考察从世族到士族的演变过程中，我逐渐将关注重点锁定在汉魏名士这一社会阶层。名士是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是社会上最具有活动力量的集团。唐长孺先生给“名士”作了一个简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3、45页。

②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版，第330、331页。

③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41页。

洁概括的说明,称“名士即有声名者,是习见于东汉的一种称号”^①。他们多数都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在清议舆论中享有盛誉,对地方乃至中央都产生极大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都处于领袖地位。名士的重要性,许多学者也都注意到了。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称:“在东汉政治上占有地位的,一面是代表王室的外戚和宦官,另一面则是代表政府的新兴士族,便是当时之所谓‘名士’。”^②唐先生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中指出:“东汉末年,大姓、名士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广泛地控制农村,文化上几乎处于垄断地位。东汉皇朝瓦解后,他们是各个割据政权的骨干,三国政权的上层统治者主要也是从老一代到年轻一代的大姓名士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③在论门阀政治时唐先生称,“东汉后期的大姓冠族及其代表人物‘名士’,一方面通过‘世仕州郡’,操纵乡论,主持选举,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又凭借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和手中的选举权,通过察举和辟举跨出地方,步入朝廷,甚至‘世为公卿’。还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特别是在地方上的势力,他们最有资格和条件荫庇逃亡农民和占有广大土地。因此我们看到,大姓名士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具有活动能量的分子,一方面他们是控制地方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央集权的对立面,并最终构成汉末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他们的头面人物通过辟举步入中央,即由世仕州郡到世为公卿后,又具有反对地方割据、维护中央政权的一面。”又称:“东汉后期,名士的活动对于当时政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选举则几乎起决定性的作用。”^④阎步克则将名士视作一个有发展源流的社会集团,并与皇权联系起来,认为“战国兴起的知识阶层入秦而衰,在汉代又依附于皇权而再度发展起来,并逐渐部分地冲破皇权的束缚,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化雄厚、影响深广、以大小名士为主体的社会集团”^⑤。汤用彤《读〈人物志〉》称:“汉魏之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3、45页。

②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169页。

③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41页。

④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3、45页。

⑤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83页。

际,在社会中据有位势者有二。一为名士,蔡邕、王粲、夏侯玄、何晏等是也。一为英雄,刘备、曹操等是矣。魏初名士尚多具名法精神,其后乃多趋于道德虚无。”汤先生并从思想史角度将清谈名士分作四个阶段,“依史观之,有正始名士(老学较盛)、元康名士(庄学最盛)、东晋名士(佛学较盛)之别。而正始如以王、何为代表,则魏初之名士,固亦与正始有异也。”^①日本学者中,如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等,则多倾向于将汉末名士称作清流士大夫。川胜在其《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一文中,将名士划分为三个等级,即第一层次乡论所形成的县乡名士等级,第二层次乡论形成的郡名士等级和第三层次乡论形成的全国规模的名士等级,并称“由乡论环节重叠构成的清议世界里,按照政府官僚的序列另外制造一个名士的序列,就好像反对政府的在野党建立自己的影子内阁那样。政府将这些人称之为党人”^②。矢野主税反对川胜关于清流势力是魏晋贵族源流的说法,指出党人与名士不是同一个范畴,党人是基于政治性目的的集团,而名士则是不带有政治性立场的集团^③。

各位学者对于名士重要性的认识从不同角度给我们以很大启发。既然就整体而言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的基础,而就一个个宗族而言则不是,那么,这里头就应该有一个转换的中心环节,这个中心环节,既要承东汉世家大族而来,又要启魏晋士族之先河;既要能显示社会阶层的整体性,又能突出组成这个阶层的个体宗族的特色。而能满足这样条件的,则非汉魏名士莫属了。名士并不仅仅从世家大族中产生,社会各阶层中都可以涌现出名士,名士们以自身特有的文化、政治性格而自成一阶层。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汉魏名士都能在魏晋时成为士族,这就表明,有了世家大族,有了名士,还不足以保证士族的形成。士族的形成,还需要皇权的支持和扶助。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曾对这一点

① 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1、205页。

② 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页。

③ 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专论》,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7页。

有所论及,他指出:“东汉著名的宗族,特点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实力,不论是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强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实权。而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显位。士者仕也。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地位,就算士族。反过来说,士族身分又可以巩固权位。当然,士族权位的轻重也因时而异,在魏和西晋,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而东晋居高位的士族,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①田先生与唐先生一样,将士族形成的时间定在魏晋,也就是将汉魏之际作为世家大族和士族的分界线。在这种演变中,田先生特意提到了士族与皇权的关系,指出魏晋士族要依附于皇权。唐先生在《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中对此有更为明确的阐述,唐先生称:“‘计门资’是从曹魏记起的。汉代大姓名士是曹魏选拔臣僚的基础,其士族地位决定于某一家族在魏晋时的政治地位,特别是魏晋蝉联的政治地位。因为最终决定于当时官位,因而在汉代算不上大姓,甚至出身卑微,只要在魏晋时因某种机缘在政治上获得一定地位,也得以上升。”他举庾乘为例,“庾乘起自卑微,成为名士,为庾氏之成为士族开辟了道路,但终于成为士族并不决定于庾乘的‘司徒辟、有道征’,而决定于魏之太仆、晋之尚书、侍中、河南尹。”^②也就是说,名士还必须仕宦通显,才能成为士族,而仕宦通显与否,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权。尽管如此,魏晋时的皇权与秦汉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秦汉时专制皇权盛极一时,无论是豪强还是世族,都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魏晋则不同,皇权虽然在力图振兴,然而由于汉魏之际名士对于皇权的有力冲击使得皇权的威严已经大不如前,同时,由于魏晋皇室都是由名士转化而来,名士在皇权的重新确立中举足轻重,因此皇权先天地受着名士阶层的制约和反击。何兹全先生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指出“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争夺,正是代表着世家豪族对集权政治的反抗”,“是集权和分权的斗争,是专制政体和世家豪族的斗争。司马氏的胜利代表着分权的世家豪族的胜利”^③。也就是说,司马氏与曹氏的斗争,并不是单纯的政权之争,而是代表着名士阶层

①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三版,第336页。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59页。

③ 何兹全《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36页。

对于皇权的反抗。名士的仕宦虽然依附于皇权,皇权在许多方面却只能与名士们平分秋色,汉魏名士与皇权就是这样处在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直到发展为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

名士既然是东汉世族演变到魏晋士族的桥梁和中心环节,那么,考察名士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了。名士兴起于东汉中后期,在同外戚宦官的斗争中,党锢名士逐渐凝聚成为有着高度自觉性的集团,这一点,许多学者都给予了关注,其中尤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称“东汉中南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在论及曹操的求才三令时陈先生又说道,“孟德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然则此三令者,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与之同者,即是曹党,与之异者,即是与曹氏为敌之党派,可以断言矣。”陈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又说:“汉祚将倾,以常情论,继之者似当为儒士阶级‘四世三公’之汝南袁氏,而非宦寺阶级‘坠阉遗丑’之沛国曹氏,然而建安五年官渡之战,以兵略运粮之偶然关系,袁氏败而曹氏胜,遂定后来曹魏代汉之局,论史者往往以此战为绍、操二人或汉、魏两朝成败兴亡之关键,斯固然矣,而不知此战实亦决定东汉中南以后掌握政权儒士与阉宦两大社会阶级之胜负升降也。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司马氏之帝业,乃由当时之儒家大族拥戴而成,故西晋篡魏亦可谓之东汉儒家大族之复兴。”^①

陈先生的主要观点,认为从袁绍到司马氏,是东汉儒家大族势力

^① 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8、51、143-145页。

的代表,而曹氏则是阉宦寒族阶级的代表。袁绍官渡战败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曹操的胜利以及曹魏政权的建立,是阉宦寒族的胜利,而司马氏代魏则是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的复兴,是儒家大族对于寒族的最终胜利。

田余庆先生对于陈先生的观点作了评论,认为陈寅恪先生“从袁绍、曹操交争看到社会阶层高低差别的实质,这是他识见卓越之处。但是陈先生将这一阶层差别的分析一直贯串到几十年后的司马氏和曹氏之争之中,而忽视了昔日较低社会阶层代表的曹氏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这一极为重要的事实,因而他对曹马党争的分析,就显得有些牵强,似不尽符合历史实际”^①。

田先生在《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一文中指出了曹袁斗争中的一系列矛盾:汉献帝代表世家大族利益,袁绍是世家大族的代表,杨彪、孔融等都是世家大族名士,然而,袁绍抛弃了汉献帝,杨彪、孔融等弃袁绍而去,曹操是打击世家大族的,而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却大量集中在曹操帐下,与袁绍对抗,并最终打败了袁绍^②。田先生没有把曹操视作阉宦势力的代表,但也未明确其身份,似乎认同陈先生关于曹操是寒族的观点,认为曹操是中小地主的代表。对于他所提出的这些矛盾,田先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在这篇文章修改稿的“作者跋语”说道:“曹袁之争的性质,在社会地位上被视为两个阶层之争,在意识形态上被视为儒法之争,这一认识是受到陈寅恪先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的启示。陈先生谓‘东汉之际,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并谓前者代表是袁绍,后者代表是曹操。我们知道,袁绍四世三公,出于孟氏《易》世家;曹操则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所以分别定他们为儒为法,是说得过去的。……对于这一史学问题,我在此文中所增添的内容,一是在曹操早期事迹中把他与士家大族之争作了勾勒,例如论证兖州之战就其基本性质说是与官渡之战一脉相承的;二是两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在曹操袁绍阵容中彼此渗透,曹操如果不重用出自

①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版,第342页。

② 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世家大族的名士,就不能使自己的势力壮大起来;三是曹操晚年政治上出现向世家大族转化的倾向,在意识形态上说就是回归于儒,这在他消灭了一切可以由他消灭的政治对手,只等着摘取皇冠的时候,是必然要出现的。所以儒家大族欲恢复其旧有的地位,不必等到日后河内司马氏之兴起。第三点意见在当时有点异端味道,因而受到怀疑。可是我确信历史就是如此。‘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曹操自己就是这样说的。”^①

田先生敏锐地指出了建安时期的一系列矛盾并力图加以解释,他的许多看法都极具启发性。但是,与陈先生一样,他将袁绍、曹操看作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认为袁绍是世家大族的代表,曹操则是寒族的代表。田先生虽没有像陈先生那样,将曹胜袁败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仅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来解释各种矛盾,认为寒族代表曹操是在世家大族的拥戴下,打败了世家大族的代表袁绍,并取代了作为世家大族的利益象征的汉献帝,似乎还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陈、田二先生的论述,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袁绍和曹操的阶级属性问题。袁绍是世家大族的代表名士是没有争议的,但曹操是否就是阉宦或者寒族的代表,是否就是站在世家大族的对立面,与袁绍必然因为阶级立场的不同而进行斗争,这点却是可以重新考虑的。万绳楠先生曾指出曹操是一个早就被汝颖人士所赏识的人物,虽出身阉宦,却并不妨害他与世家大族的结合,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出身,而在能否互为利益^②。马植杰先生也持类似看法,认为曹操的政治声望和实力虽然比不上袁绍,但从早年起就与当世名士大族有着密切的交往,日后也最能得世族地主的拥护,说明曹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声望也是很高的^③。唐长孺先生则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曹操本人即具有名士身份^④。循着这样一个思路,很多问题便可

①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重订本,第161-162页。

② 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

③ 马植杰《论汉末魏晋之际世族地主势力的消长与曹魏政权的兴亡》,《史学月刊》1965年第5期。

④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页。

以有了更好的解释。曹操和袁绍都是名士,都是世家大族的代表,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因此,他们在早期能够交好,他们的阵营中才能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正因为曹操本身即是世家大族的代表名士,所以才能得到世家大族的拥戴,才能与袁绍一争高下。袁曹之争,实际上是名士阶层内部的分化斗争。

党锢名士虽然已开始形成自觉的政治集团,有了共同的政治目标,但还没有从狭隘的地域观念中走出来,这种地域性,妨碍着全社会范围内名士阶层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关于汉晋间区域格局的变化,胡宝国先生在《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①以及《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②这两篇文章中有详细的阐述。他首先指出战国时代形成的文化区至西汉并没有发生大的变更,表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与扬雄的《方言》中大量使用战国国名来标明区域界限,方言区有着明显的战国痕迹。但是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以兖、豫为主体的中原地区。胡先生还指出了地属荆州的南阳郡在文化学术上与汝、颍地区的一致性。

东汉以后各地名士以州郡为单位自成一体的现象,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尤其是汝颍名士集团更是颇受关注。实际上,不光是汝颍,其他地区如冀州、兖州、荆州、凉州等,都各有本州的名士集团。方诗铭先生就曾对凉州集团、并州集团、颍川集团、河北集团等都有过相关的论述^③。余英时先生也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指出,“至于南北部之名则又显示士大夫之地域分化,为当时士之内在分化之一重要层面”,“下逮党锢之祸,士大夫之地域分化已甚为普遍”,“东汉末叶以来,各地士大夫皆自成集团,此可与前文论交游结党之风互相参证者也。此种风气虽非地域分化一观念所能完全解释,然地域分化必为其中一要目则殊无可疑。而尤足以显示士大夫地域分化之观念者,则为孔融与陈群之汝颍人物论”^④。因为传统的关系和

① 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③ 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2002年重印本。

④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262页。

利益问题,州郡名士们往往对非本州郡的其他名士采取排斥甚至敌视的不友好态度,由此增加了汉末建安时期政治军事斗争的复杂性。然而正是在这种冲突斗争中,各地名士最终冲破了地域观念的局限,走向了完全意义上的阶级认同,最终以士族的共同身份登上历史舞台。

但是,汉魏名士在形成、发展和逐渐凝固中却并不是以同一的性格和面貌出现的。他们从产生之日起就有着异彩纷呈的个性特征,如果做一个大概的区分,我们可以把汉魏名士分为事功派和浮华派两类,这种区分是受到了马植杰先生的启发。马先生在《论汉末魏晋之际世族地主势力的消长与曹魏政权的兴亡》一文中,将世族地主区分为具有实际才干的事功派和名浮于实的清议派,并且将这种区分进一步延伸至司马懿与曹爽的政权之争,指出曹爽派是代表腐化已深的曹魏皇族与世族地主中的浮华派,司马懿派则是代表从曹操以来世族地主中的事功派。王晓毅先生在《正始改制与高平陵政变》一文中也持类似看法,认为“高平陵政变的性质,既不是士阉之争,更不是统治阶级内部毫无道理的派系倾轧,而是曹魏新、旧二代之间的冲突,即魏初名士与正始名士之间的冲突。从意识形态方面看,则是魏初名实派与玄学流派的斗争”^①。他所讲的魏初名士是指“以曹氏父子为领袖的活跃于建安—黄初时代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新兴知识群体。这个群体由汉末名士子弟与战乱中崛起的地方豪绅融合而成。从政治上看,他们是曹魏帝国的缔造者及文臣谋士;从社会史上看,是尔后魏晋南北朝士族社会的开创者;从思想文化上看,则是创作建安文学的艺术大师和校练名理的魏初名法派思想家”。而正始名士则是指“活跃于曹魏太和—正始年间政治和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以何晏、夏侯玄和王弼、钟会为代表的曹魏第二、三代中青年士族知识精英。作为更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正始名士无疑比其父辈活得更洒脱,他们是历史上著名的清谈家和思想自由派人物”^②。

这样,在观照了传统的士大夫与阉宦、士族与寒庶以及政治党派的区分后,我们试图从名士阶层内部的分化来考察汉魏政治、社会的

① 王晓毅《正始改制与高平陵政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② 王晓毅《汉魏之际士族文化性格的双重裂变》,《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

变化。在这样一个视角下,汉末的袁曹之争、曹魏三代的禁浮华、司马懿与曹爽的政争等一系列政治活动都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合理的解释。从曹操经曹丕、曹叡一直到司马氏,都可以视为名士阶层中的事功派,他们重才能,务实效,有着清醒冷峻的现实性格;而从袁绍到孔融、边让到何晏、邓飏等,则都可以视为名士阶层中的浮华派,他们善谈论,好交游,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追求玄远自然的超脱境界。事功派在政治斗争中总是居于有利地位,而浮华派则在社会文化价值观领域最终取得了主宰地位,二者虽然互相斗争,却又互相依赖,最终融合为独具特色的士族,完成了从名士到士族的演变。